

## 中阿文明交流： 历史机理、现实关切与前景展望<sup>\*</sup>

丁俊 李清扬

**摘 要：**世界文明千姿百态，多种多样，各种文明并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相互隔绝或相互对立的。相互交往交融是人类文明发展和成长的常态，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与互学互鉴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而不竭的动力之源。两千多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和“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构成中阿文明交往交流的历史主旋律。中阿两大文明的交往交流不仅历史悠久、成就突出，而且特色鲜明。新时代的中阿文明交流秉承丝路精神历史传统，顺应和平发展时代潮流，致力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冲突。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交的总目标，促进中阿文明交流是新时代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交的努力方向。一方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要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提升中阿综合实力，不断夯实两大文明交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双方要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往互鉴，持续提升两大文明相互交流的质量。

**关 键 词：**文明交流；中国；阿拉伯国家；中阿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丁俊，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83）；李清扬，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2023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1620）。

**文章编号：**1673-5161(2025)01-0003-29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sup>\*</sup>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文明发展趋势研究”（22JJD810032）的阶段性成果。

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中阿文明拥有许多共同共通、相似相近的价值理念,两大文明关于人类平等尊严、文明和衷共济以及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等一系列伦理思想高度契合,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使两大文明始终保持交而互通、包容多样、和谐共生的良性交往。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讲,“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近代以来又都在时代变迁中经历过曲折,实现民族复兴始终是我们双方的追求。”<sup>①</sup>“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sup>②</sup>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断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人文滋养和精神资源,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sup>③</sup>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目标之一。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共同利益;聚焦经济发展,促进合作共赢;维护地区和平,实现共同安全;加强文明交流,增进理解信任。<sup>④</sup>四大行动分别对应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关系、经济发展、共同安全和文明交流四大领域,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外工作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sup>⑤</sup>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新时代的中国中东外交积极作为,积极开展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国家间的文明交流,有力有效促进中东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发展,以实际行动回答“时代之问”与“中东之问”,为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阿拉伯国家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欢迎。本文聚焦中阿文明交流,通过对文明

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5 页。

② 同上,第 323 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问答》,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23 页。

④ 习近平:《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 年 1 月 10 日,第 1 版。

⑤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共产党员网,2024 年 7 月 21 日,<https://www.12371.cn/2024/07/21/ART11721551217863166.shtml>,上网时间:2024 年 8 月 1 日。

交流的共性和对中阿关系的历史梳理,尝试回答与总结:中阿文明交流为何长期保持友好和谐以及如何维持友好和谐,据此进一步讨论对中阿文明交流的现实关切与前景展望。

## 一、文明交流的一般特征

一般认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作为涵盖社会科学诸多要素的复杂概念,至少包括“高度发展与体系化的人类社会”“特定地区与特定时期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世界与社会中的所有人”以及“对比于原始的现代人类生活行为”。<sup>①</sup>在社会科学范围内,关于文明的讨论涉及到地理、文化、社会、经济和集体等,<sup>②</sup>因此,“文明”也是一类没有边界的共同体概念,从社区小共同体到人类大共同体都可以称为“文明”。虽然文明交流的含义超越国家,但是文明交流的概念则主要由国家塑造。具体而言,文明交流是后验概念,需要体现在后世对前世的定义,而前世往往不清楚自身是否处于文明交流。与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一样,关于文明交流的一般特征也存在下述三个维度的讨论:文明交流的媒介是物质还是观念?文明交流的主体是个体还是共同体?文明交流的普遍特征是和谐还是冲突?<sup>③</sup>

### (一) 物质与观念维度

文明的交流大致都以物质或精神为主要媒介。譬如,在毛皮之路、香料之路、丝绸之路以及新航路中都伴有物质资源的交换和价值理念的传递。<sup>④</sup>那么,在文明交流中,物质与观念的关系是什么?

① [英国]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九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94页。此外,德国《迈尔百科辞典》将文明定义为人类原始社会之后的发展阶段,物质文化有明显提高;《西班牙百科全书》将文明定义为层次高于文化但广泛不如文化,文明即居住在一定地区之内并为大家公认的合法当局所统治的人群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组织;日本《世界文化大事典》认为文明与野蛮对立,文明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精神(艺术、宗教、道德、科学、法律等)和物质(产业、技术、经济等)的总体;《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文明不再与野蛮相比,而是人类与自身的遗传相比,使自身摆脱动物的兽性回归人性,人类在身体结构方面是代代遗传不论文明程度的高低,文明则是对语言、宗教、信仰、道德、艺术和人类思想与理性的表述,是无法通过生物遗传获取,只能通过模仿和教导传递。

② [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页。

③ Tang Shiping,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41, No. 2, 2010, pp. 211-249.

④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一类学者认为,文明交流必然有物质的或观念的本质。文明交流或以物质文明的形式出现,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衡量文明交流的指标则可以量化为贸易额的多少或是具象化的程度。<sup>①</sup> 文明交流的本质又或是精神的交流,人文精神成为了文明的本质内涵,是人类各种文明形态的真正核心,在此语境下,文明交流的内在逻辑与涵化基线即是精神文明。<sup>②</sup>

另一类学者则认为文明交流并非单纯的物质或观念交流,而是物质与观念交流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文明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相结合,物质文明被定义为人类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的“第二自然”或是“人化自然”,<sup>③</sup>精神文明则是伴随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出现对主观世界的改造。<sup>④</sup> 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产生并统一在人类劳动之中,二者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互为条件、互为目的和不可分离的,<sup>⑤</sup>进而认为,劳动是全部文明的基石。<sup>⑥</sup> 同时,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明,是一定政治和经济的反应,又影响与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sup>⑦</sup> 在此意义上,经济成为基础,经济和政治共同决定了文明的形态,文明成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 (二) 个体与共同体维度

对于文明交流的主体和驱动力而言,更多是个体的生物本能,是一种自发行为,还是群体的社会促成,是一种自觉行为? 对于前者而言,有学者认为个体的能动性对于共同体有重要影响。譬如,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实际上是偶然的与个体自发的因素所导致的欧洲文明与美洲文明的交流,因此,个体的作用决定了早期人类文明的交流。<sup>⑧</sup> 更多学者则认为,虽然文明交流的主体存在多元差异,但其本质都是一种共同体性质的自觉行为,并对此展开了关于人文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人民外交、思想外交、观念外交和价值观外交等的讨论。

① Leslie A. White,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System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ribes and N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3-13.

②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第 49-50 页。

③ [德国]马克思、[德国]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02 页。

④ [德国]马克思、[德国]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94 页。

⑤ 林京耀、郝怀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6-55 页。

⑥ [苏联]列宁:《列宁全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96 页。

⑦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624 页。

⑧ Alfred W. Crosby, Jr.,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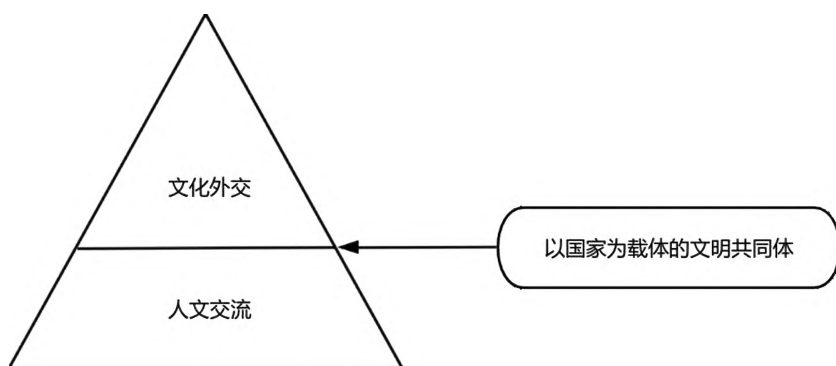


图1 共同体与文明交流的驱动力和方式

在后一类学者看来,虽然文明交流的驱动力和主体以作为个体的人为基本单位,但是作为个体的人背后是国家与社会共同体的作用。在此意义上,没有共同体的足够支撑,则个体的文明交流也难以实现,至少是难以被叙述和保存的,因此,无论是政府性弱的人文交流抑或是政府性强的文化外交,其关键驱动力都是共同体的自觉行为(见图1)。<sup>①</sup>其中,中国人文外交和人文交流的概念首次出现在2008年,<sup>②</sup>实质上是一种具备主体权威性、内容人文性、方式灵活性、目的战略性特征的国家外交新形态和文明交流新图景。<sup>③</sup>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都是以政府为主体,前者更加偏好渐进式的实现外交目标,强调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和目标的长远性,<sup>④</sup>后者则议题较广突出政治和安全关切,同时也更强调议题的紧迫性。新时代中国的人民外交和民间外交以中国经济成果、文化包容、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情感为三大支柱,<sup>⑤</sup>表现出中国外交的人民属性,<sup>⑥</sup>与西方语境下强调价值观输出的外交有着根本区别。从生物个体的偶然因素到共同体的自觉必然,文明交流事实上成为了以作为个体的人为重要载体,国家为重要依托的共同体间互动行为,同时,在共同体中的文明是没

① 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共同体平衡人类对于安全和自由的需求。同时,共同体的发展模式是从中心到次中心和边缘的射线,是自觉对个体的驱动力。参见[德国]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5-106页;[波兰]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② 杨洁篪:《北京奥运积极影响中国外交——对〈世界知识〉书面采访的答复》,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20期,第38页。

③ 赵可金:《人文外交:全球化时代的外交新形态》,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73页。

④ 范勇鹏:《论文化外交》,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21页。

⑤ 俞新天:《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理论初探》,载《国际展望》2023年第5期,第1页。

⑥ 张骥、丁媛媛:《中国民间外交、地方外交与人文交流70年——人民的外交》,载《国际展望》2019年第5期,第54页。



有边界的。在本文的语境下,文明间的边界实际上难以界定,但是现代国家的边界已经界定;文明又依托于国家。因此,文明交流的领域既可超越国家,同时又会受到国家的限制。

### (三) 和谐与冲突维度

对于文明交流的方式和常态而言,更多是和谐交往促成文明交流,还是由于冲突导致文明交流?至少在当今时代,文明交流的实质是以国家为依托的互动。公元前 1000 年至今,地球的政治实体从 60 万个演化到 200 多个。有学者认为,只有通过战争与征服存活的文明实体才能被今天所见,譬如,古代印度与古代希腊等。<sup>①</sup>要是这样,那么冲突就有可能是文明得以存续的一种条件,文明间的冲突也是人类文明交流的一种客观存在和方式。

#### 资源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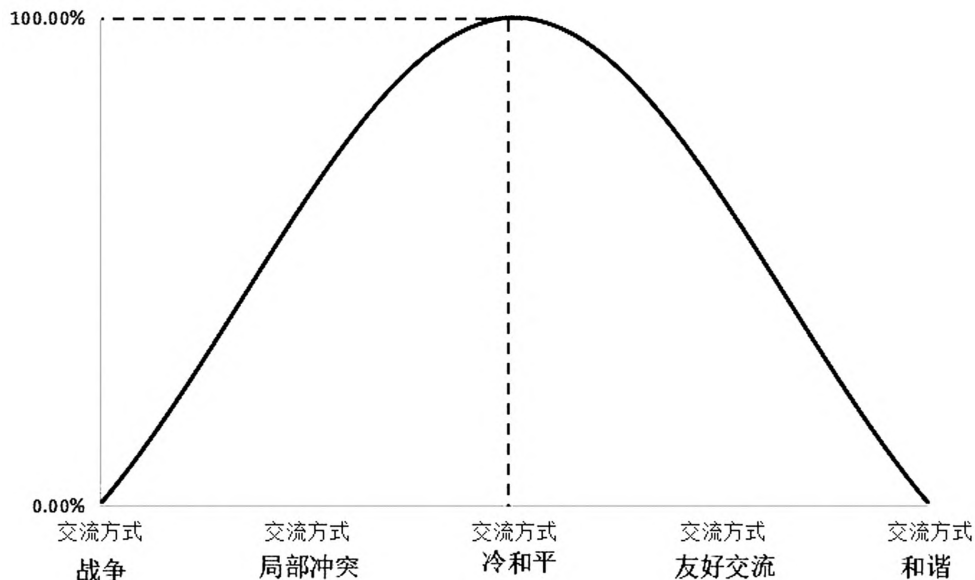


图 2 资源阻隔与文明交流

关于文明交流的冲突与和谐这两大主要方式,一方面,虽然文明冲突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中常见的,但是需要区别作为历史常识、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文明冲突。20 世纪末,学术界出现了大量关于无政府状态下文明冲突的观点:在弗朗

<sup>①</sup> Robert Carnerio, “Political Expansion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ompetitive Exclusion,” in R. Cohen and E. Service, eds., *Origins of the State*, Chicag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78, pp. 203-223.

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终结论”之后,<sup>①</sup>有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的“圣战与麦当劳两个世界论”,<sup>②</sup>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无政府状态临近论”,<sup>③</sup>以及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等。<sup>④</sup>事实上,这些学术观点都是二元对立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在亨廷顿看来,这样割裂的历史观即是西方需要使自己免受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sup>⑤</sup>21世纪初,西方国家为了现实政治目的将文明冲突的学术话语转化为政治话语,形成了事实上的等级制文明交流,当国家可以通过文明和谐获得更高利益时呼吁文明间的对话协商,反之则强调文明间的威胁和冲突。另一方面,当文明间冲突成为常态时,文明间的和谐交流则是十分可贵的。同时,西方关于文明间和谐交流的理论十分稀缺,更多是政治话语的呼吁而非理论的建构。<sup>⑥</sup>从已知人类文明交流的历史中至少可以得出:资源的稀缺使文明限定在一定地域,只有资源限制较少的文明间才可能出现比较密切的互动,这些互动的方式包括稳定和平的建构、友好交流、冷和平、局部冲突、全面战争等;当资源限制较多的文明开展交流时,会在友好交流到局部冲突之间选择,并且更多停滞在冷和平状态(见图2)。

因此,人类文明交流的历史实质是以物质和精神为主要媒介,是在共同体自觉指引下的互动行为,是从多数弱势文明走向少数强势文明的过程,并往往伴以文明间的碰撞乃至冲突。然而,纵观中阿文明交流的历史,除了古代怛罗斯之战(公元751年)那样十分罕见的边境冲突之外,双方实现了千百年的友好交流,成为文明间和谐交往可贵的经典案例。放置于人类文明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发现,较少的资源阻隔使阿拉伯文明与欧洲文明较早进入文化外交,从而实现更高可能的和谐与战争(且多为战争),同时,较多资源阻隔使阿拉伯文明与中华文明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pp. 3–18.

② Benjamin Barber, *Jihad vs. McWorld: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a New Century: A Read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3–33.

③ Robert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7, No. 2, 2000, pp. 95–96.

④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1993, pp. 22–49.

⑤ [德国]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3–436页。

⑥ 国际关系的共生理论提及过文明间的和谐交流。参见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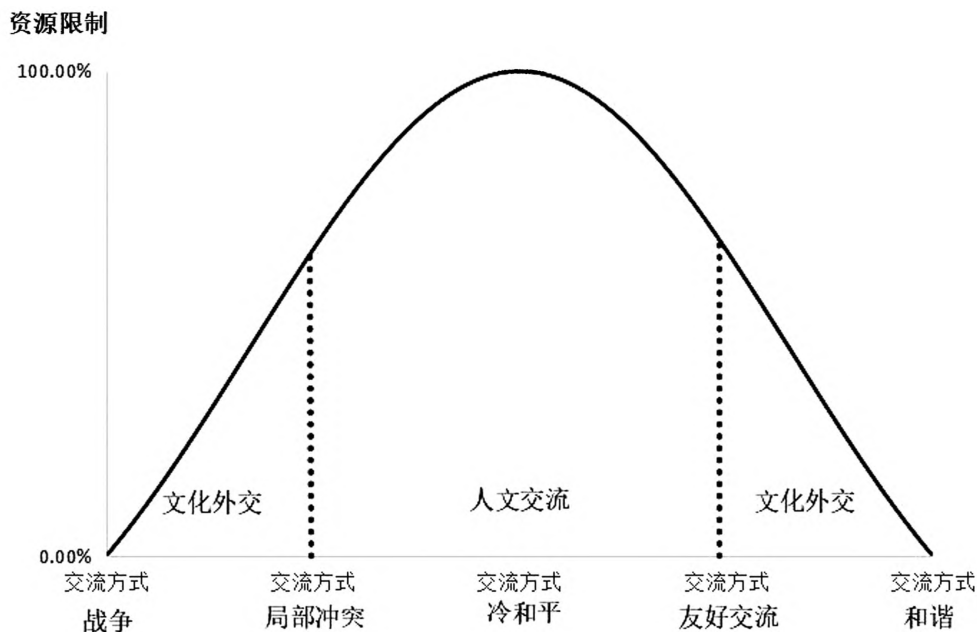


图3 人文交流、文化外交与文明交流的形态<sup>①</sup>

长期处于人文交流的冷和平状态,因此难以出现更高层次的和谐与更深程度的战争(见图3)。<sup>②</sup>

工业革命之后,中阿文明交流的资源限制锐减,双方有更高可能的和谐与战争。然而,中阿文明交流却能够实现长期可贵的友好与和谐。如何解释近代以来中阿文明交流的友好与和谐?如何维持中阿文明交流的友好与和谐?这一选题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同时,以往学界对此的解释多出于对中阿人文交流议题本身的理解,<sup>③</sup>而没有提升到国家与国际关系的理论视角,没有体现文

①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最为广义的文化外交包括人文交流,本文所指文明交流都是在国家共同体的范畴之内。同时,资源限制具体而言包括:物质条件的限制、地理条件的限制、国家利益的限制、战略文化的限制以及第三方文明/国家的限制。

② 哈全安:《比较文明视角下的欧洲与中东——同源性与异质化的历史考察》,“知远论坛”,安徽师范大学,2020年8月24日;张楚楚:《欧洲与中东,想象中的文明冲突》,“复旦通讯·东西交流”,复旦大学,2021年4月15日。

③ 参见史廪霏:《“一带一路”视角下中阿文化交流》,载《中国穆斯林》2018年第1期,第27-29页;张婧姝、赵丹宁:《“一带一路”背景下中突人文交流发展研究》,载《阿拉伯研究论丛》2021年第2期,第19-38页;郭存海:《中阿人文交流机制建设:发展、挑战和建议》,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1-6页;李赫男、罗林:《搭建中阿文化交流新平台的探索》,载《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3期,第55-57页;包澄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第140-160页;丁俊、陈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人文交流述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5期,第29-45页。



明概念本身之于国家的战略价值,本文将国家实力、资源限制和第三方影响视为自变量,中阿文明交流的质量为因变量,从而对中阿文明交流提出国际关系视角的分析。

## 二、中阿文明交流的历史机理

对于中阿文明交流而言,首先,人民是文明交流最重要的载体,<sup>①</sup>中阿文明交流有着物质交换和理念传递的双重关怀。其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线中,更多是双方国家主导下的个体交往,双方国家为个体交往提供了强力支撑。最后,和平交往与友好相处是中阿文明交流一以贯之的主旋律。在经历古丝绸之路、民族解放斗争、经济全球化和动荡变革时代之后,“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凝聚成为中阿友好精神。<sup>②</sup>中阿文明交流的历史机理足以诠释中阿文明交流长期处于友好状态的内在逻辑与思想根源,并对总结中阿文明交流的现实关切和探索前景展望提供指南。

### (一) 后古典时代及以前的中阿文明交流

中国两汉时期的汉语历史文献就开始记载了华夏族人与闪米特人的文明交流,<sup>③</sup>张骞、班超等人出使西域行近今日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开辟古丝绸之路,连接中阿文明。司马迁、班固等人有著述中都有对阿拉伯地区比较粗略的描述:《史记》将叙利亚与伊拉克地区描绘为“条支,人众甚多,安息役属之”<sup>④</sup>,《汉书》将临近阿拉伯的伊朗高原描述为“乌弋山离国户口胜兵,大国也”<sup>⑤</sup>。南北朝时期,范晔对阿拉伯地区有更具体的描绘,中阿交往开始从重视国力与战略关系转移到比较宽泛的物质资源交换,“条支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sup>⑥</sup>。同时,这一时期阿拉伯

①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年5月15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年1月10日,第1版。

③ 一般意义上闪米特人的后裔包括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阿拉伯人特指伊斯兰化以及阿拉伯语传播之后的民族。本文将阿拉伯帝国之前的阿拉伯族称为闪米特人,阿拉伯帝国时期以及之后称为阿拉伯人。

④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年版,第7285页。

⑤ 班固:《汉书·卷九十六(西域列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页。

⑥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0页。

商人通过印度洋与马六甲海峡,经水路来到中国开辟中阿文明交流的“香料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城在公元 2 世纪前后成为国际贸易的都市与中阿文明交流的重镇。<sup>①</sup> 在世界性宗教出现以前的古典时代,<sup>②</sup>中阿文明交往既没有冲突也没有合作,而是有限与稳定的接触,双方都更倾向于处理各自区域内事务。一方面,古代中国需要应对北部游牧文明的威胁,没有足够外交施展空间,对中国而言,阿拉伯文明虽然没有安全威胁,但是也无法提供反制游牧文明的战略价值(这一点在《汉书》中有足够的体现)。另一方面,多元的资源限制和伊朗高原地区帝国文明长期存在的权力辐射,使尚未统一的阿拉伯诸国难以与古代中国产生直接联系。

后古典时代的中阿交往,体现在不断变迁中的中华王朝与阿拉伯帝国更加复杂与密切的互动。唐王朝时期,中阿已经确立正式的官方联系,阿拉伯使节到访都成长安多达 42 次。<sup>③</sup> 宋王朝时期,中阿官方交流也多达 40 余次,此外,来华贸易的阿拉伯人遍布广州、泉州、杭州和扬州等东南沿海地区。<sup>④</sup> 在文明交往的后古典时代,中阿双方关于彼此的著作也不断增加,譬如,唐人杜环的《经行记》有关于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和中阿贸易现状的具体记述,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描绘麦加地区阿拉伯人生活的详细情景。中世纪阿拉伯文献学家伊本·纳迪姆在《目录》中也提到了阿拉伯人与唐朝的交流情况,包括阿拉伯人娶中国女子为妻的记载。此外,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阿拉伯人眼里的中国形象,提到了唐朝的行政制度、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广州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等。<sup>⑤</sup> 同时,在中阿交流日益密切的背后,是两大文明有限合作与潜在冲突的并存。一方面,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发生过怛罗斯遭遇战,由于是未动员的偶发边境危机,两国迅速实现停火。另一方面,在怛罗斯遭遇战几年后的“安史之乱”中,唐王室与阿拉伯帝国形成反对安禄山的联盟,唐王朝甚

① [美国]P. K.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86 页。

② 皮特·斯特恩斯将世界文明史依据第一个世界性宗教的诞生(伊斯兰教)、欧洲新航路与扩张、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在伊斯兰教以前为古典文明时代。本文采用 1494 年西班牙、葡萄牙《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为分界线,将该条约视为西方文明扩张的开始。[美国]皮特·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赵轶峰等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2 页。

③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3 页。

④ 张铁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载《西亚非洲》1984 年第 2 期,第 75 页。

⑤ 母仕洪:《古代阿拉伯著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以〈中国印度见闻录〉为中心的考察》,载《回族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95-100 页。

至得到阿拉伯帝国的军事援助。<sup>①</sup> 蒙古帝国崛起后,由于亚非欧大陆间的战争与贸易更加密切与频繁,中国的印刷、造纸、火药等技术以及阿拉伯文明的诸多文明成果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欧亚大陆两侧得到空前的交流,在伊尔汗国与蒙元帝国两大蒙古政权的推动下,中阿文明交往开始由交流走向交融。<sup>②</sup>

## (二) 新航路之后的中阿文明交流

蒙古政权衰败之后,多元因素的促成彻底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中阿文明交流。<sup>③</sup>

第一,中阿文明交流从两强帝国的支持转化为中原王朝强大的明、清帝国对多元阿拉伯国家的文明交流,中阿文明交流受到严重阻滞。一方面,阿拉伯文明不再有足以依托的帝国支撑,而是碎裂成了奥斯曼帝国、阿丹国(也门)、鲁密国(阿曼)、祖法儿国(阿曼西南部)、天方国(沙特)、默德那国(麦地那)和麻林国(肯尼亚)等诸多包含阿拉伯民族的国家。除了奥斯曼帝国之外,阿拉伯民族都处于脆弱国家中,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不允许境内阿拉伯人获得足够与外界交往的权力,这一时期阿拉伯民族整体都处于文明交流的不利局面。<sup>④</sup>直到18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放松对于阿拉伯人政治权力的限制,允许非奥斯曼土耳其族担任地方行省的要职,<sup>⑤</sup>从原先宗教神权主导的封建军事复合体模式和米勒特制度转向分享权力与重视帝国境内各民族群体的利益。<sup>⑥</sup>另一方面,当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阿拉伯民族有足够的外事交往权力时,明、清帝国却开启国家外事政策的剧烈变动,从积极管理朝贡国转向绝对的孤立主义和闭关锁国,实施“海禁”政策。从《万历明会典》和《大清会典》可知,明、清时期中国的朝贡国从原先东南夷上18国、东南夷下44国、北狄8国、东北夷2国、西戎上58国和西戎下14国,共140余国走向东北亚与东南亚共7国左右,致使近代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受到大幅削弱。<sup>⑦</sup>

第二,随着科技发展,虽然地理条件制约中阿文明交流的能力持续下降,但

① 刘昫:《旧唐书·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3年版,第5315页。

② [日本]杉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72-73页。

③ Hyunhee Park, *Mapping the Chinese and Islamic Worlds Cross-Cultural Exchange in Pre-modern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7-19.

④ Bruce Masters, *The Arabs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16-1918: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0-30.

⑤ Jason Goodwin, *Lords of the Horizons: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Book, 1999, pp. 171-185.

⑥ 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 土耳其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9-93页。

⑦ [日本]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6页。

是近代中国的战略思维阻止了中阿文明在官方层面的进一步交流。对于奥斯曼帝国之外的阿拉伯众国,明、清时期的中国则抱有天朝上国的朝贡体系思维来处理两大文明关系。近代中国天朝思维的本质是将文明之间塑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中国成为朝贡体系的核心,从而限制了明、清时期中国与阿拉伯诸国平等交流的可能性。<sup>①</sup>以鲁密国(阿曼)为例,在 15 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之后的百年内,鲁密国来华朝贡并得到明代中国官方的多次记录。<sup>②</sup>除了中阿文明官方的朝贡等级关系以外,这一时期双方在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多个层面都有所发展。在经济方面,广州、泉州成为重要国际贸易港口,吸引大量阿拉伯商人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通过海路运往阿拉伯地区,同时,阿拉伯的香料和药材也进入中国市场。<sup>③</sup>

在宗教文化方面,大量阿拉伯学者和传教士来到中国,同时,中国的儒道佛文化也对阿拉伯地区产生影响。<sup>④</sup>一批中国学者开展的“伊儒会通”活动将两大文明间的交流交融提升至哲学层面。中阿文明在近代的人文交流是双方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加深了双方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促进文化、科技和经济等领域的进步,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双方丰富的人文交流与等级的政治关系也是阿拉伯文明脆弱帝国体系的表现,阿拉伯国家缺乏足够实力为阿拉伯的文明交流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明、清帝国朝贡体系在西亚北非的出现,以及双方文明交流局限在人文领域成为必然。

### (三) 近代的中阿文明交流

近代中阿文明交流既承接古丝绸之路的传统友谊,又有在西方殖民阴影下的内生性和独立性等特征。

一方面,近代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文明交流大多以民众自发性的人文交流为主,并且聚焦在学术和宗教等领域,学者和宗教人士通过游历、朝觐、译书著说等方式参与中阿文明交流。譬如,1845 年,马德新根据其经历撰写《朝觐途记》,介绍阿拉伯各城市的社会文化,成为中阿文明交流史的重要文献。在近代埃及陷入殖民危机时,中国学界开始大量出现关于埃及的译著,包括麦鼎华翻译与出

---

① 王泉伟:《天朝意识与明清时期中国的朝贡外交》,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93 页。

② 马一、谢梓锴:《明代朝贡国“鲁密”考》,载《暨南史学》2021 年第 2 期,第 153 页。

③ 徐文彬、钟羨芳:《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泉州回民群体特征的形成》,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第 44 页。

④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全球视野中的明清鼎革》,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34 页。

版的《埃及近世史》、赵必振翻译的《埃及史》以及文明书局出版的《埃及惨状》。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也相继到达阿拉伯世界,对该地区的制度、文化与局势进行考察以谋近代中国的出路。

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关注也逐步增多。在19世纪80年代阿拉伯世界出现的私人报纸中,《摘要》期刊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汉语表达和风俗习惯,还翻译了慈禧太后与李鸿章等人的传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阿拉伯世界的学者还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并对这场战争进行评论和反思。譬如,政治家沙基布·阿尔斯兰撰写过一系列关于“中国未来”的评论,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根源在于科技的落后和现代军事训练的不足,同时,由于中国的历史根基深厚,所以西方难以完全接管中国。

中阿文明交流在工业革命之后遭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进入20世纪前夜,北大西洋两岸逐渐从“美国例外”论转向“美欧同源”论,美国与欧洲开始塑造“大西洋共同体”的观念和西方文明的话语叙事。<sup>①</sup>从希腊罗马文明、欧洲文明、美利坚文明到西方文明,西方通过民族国家兼容殖民帝国的政治模式、自由贸易兼容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大陆均势兼容海外优势的安全模式,实现从北大西洋两岸向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入侵。然而,面对民族国家的现代战争,中阿文明的代表分别是守成的清帝国和破碎的奥斯曼帝国,没有强力国家加持下的中阿文明都走向衰落的边缘。在一些学者看来,西方文明本身“文明与野蛮”的叙事暗含其思维内核的二元对立性,因此,西方文明开始建立等级性的世界秩序并不断向世界其他文明扩张。<sup>②</sup>

为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文明交流逐渐呈现出多线交织的历史图景。中阿两大文明不仅在文化上互动日趋频繁,在反帝反殖民中相互声援,而且不断驳斥西方中心论。人文交流层面,1931年中国学者马坚在埃及留学期间将《论语》翻译成阿拉伯语公开出版,同时,将阿拉伯名著《回教哲学》等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1940年,中国学者纳训翻译并出版了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政治互动层面,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反对西方的斗争和争取民族独立予以极大肯定。同时,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也得到阿拉伯国家支持,有伊拉克退役军官和医生希望来华参战。1938年中国近代社会活动家达浦生前往埃及、沙特等中东国家进行抗日宣传,撰写《告世界穆斯林书》,阐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对日本帝国主义予以谴责和制裁。商业交往层面,中国大豆

① 王立新:《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载《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第1页。

② 田文林:《“文明与野蛮”叙事与等级性世界秩序》,载《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5期,第114页。



从东北港口城市出发抵达地中海,同时,中国为埃及的香烟和雪茄提供重要原材料以便于其畅销世界,形成了非西方社会强压下的商品供需循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启的去殖民化浪潮,使西方文明入侵非西方文明的成本飞速提升,中阿两大文明都开启了文明重塑与文明交流的新阶段。

#### (四) 中阿文明交流的历史机理

第一,只有当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有足够实力的国家为依托时,双方才有可能实现有显著实际成效的文明交流,古代强大帝国为文明交流提供了强力支持。在此视角下,中阿文明交流的历史实际就是古代中国与波斯帝国(及其周边闪米特族)、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境内阿拉伯族以及阿拉伯诸国)的交流历史,只有当双方的国家足够强大时,才能对彼此文明的生存提供基本保障,才有可能支撑和支援对外交流。

第二,物质条件的制约(地理阻隔与生产力限制)与精神条件的制约(国家利益和战略文化),使近代以前的中阿文明交流合作不至于过于密切,也使冲突不容易发生。中阿文明之间既不存在长期密切合作处于联盟状态,又不存在预防性战争、战争边缘与冷和平的状态,更不存在长期军事对峙甚或处于战争状态,在这一基础上两大文明总能和谐相处且相互交往不断提升。同时,由于近代中国的天朝等级思维以及中阿国家间利益交集的不足,使两大文明体系的交往体现出经济文化热和相对的政治冷;在近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低政治领域密切互动时,高政治领域双方都在寻求对周边安全的基本保障。因此,在中阿千年的文明交流中更多以和谐为主流,体现在贸易、经济、文化、科技和民族融合等非政治领域。20 世纪之后,中阿文明交流逐步摆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限制,双方走向现代生产力以及平等的文明交流模式,为中阿文明交流全面拓宽合作领域提供基础。

第三,从中阿文明交流的开端起,双方文明的交流始终受到第三方文明的剧烈影响。在西方文明的扩张时代之前,中华文明北部的草原帝国文明以及阿拉伯文明北侧的高原帝国文明均制约了中阿文明交流,双方都更加关注周边近邻文明带来的安全问题而非远方的陌生文明。在西方文明的扩张时代之后,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均遭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冲击和侵略,双方文明本身的存续举步维艰,直到 20 世纪中叶,独立的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才开始了中阿文明交流的新篇章。只有当作为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载体的国家具备战略自主且相对强大的实力时,譬如唐、宋王朝与阿拉伯帝国的交流,双方文明交流才可能较少受到第三方文明的影响。

中阿关系史是一部和平、友好的交往史,也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鉴的互动史,

一部甘苦与共的奋斗史,两大民族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等问题上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借鉴。<sup>①</sup>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文化共性也为双方的文明交流提供坚实基础,同为世界上历史底蕴深厚、文化内涵丰富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都坚持“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sup>②</sup>等价值观念,两大文明对于和平友爱、多元和谐以及伦理道德等层面有广泛共识,<sup>③</sup>为中阿文明良性对话提供思想基础,也为双方在人文领域的友好交流增添了实际助力。因此,中阿文明交流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和相互依存性的特征。中阿文明千年的友好交往才凝聚成了“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中阿文明交流既是对本我文明的自觉性反思,也是对他者文明的自觉性借鉴,从而使当代中阿文明交流的内涵、机制得到实质性提升。

### 三、中阿文明交流的现实关切

现当代意义上的中阿文明交流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具体而言,各阿拉伯国家的先后独立及其与新中国的互动才是当今中阿文明交流的起点。历史表明,只有当中阿文明都拥有较高的国家实力时,双方文明交流才有可能从浅层的人文交流走向深层的文化外交。同时,只有当中阿文明交流呈现出平等性质而非等级性质时,双方文明交流才会有实质意义的提升。因此,中阿文明交流的现实关切至少包括对双方国家实力的关切以及对文明平等交流的关切,此外,还需要应对文明交流的第三方风险并强调中阿文明本身的价值内核。

#### (一) 国家的安全、发展关切

没有实力足够强大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支撑,就不会有足够影响力的中阿文明交流,在此意义上,中阿文明交流依然是一类后验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阿文明交流的载体已经从古代帝国转向现代国家。<sup>④</sup> 无论对于两类共同体的性质和功能如何区别,两者的实力关切是相似的,即安全与发展。

没有国家安全的文明交流是无意义的文明交流,没有国家发展的文明交流

<sup>①</sup> 卢秋怡、丁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历史特征与当代发展》,载《回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70页。

<sup>②</sup>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23页。

<sup>③</sup> 王广大、古萍:《文化共性视角下的中阿文明交往》,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第58-68页。

<sup>④</sup> 刘德斌:《世界的重塑: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6期,第11页。

则是难以持续的文明交流。对于安全关切而言,从解放战争开始,中国极其特殊的战略地位使美国与苏联都相继拉拢未来中国新政权。然而,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战略地位的变化使国家安全面临美国与苏联的双重风险。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逐步打破外交孤立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同时,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sup>①</sup>中国外交重点从意识形态和安全关切转向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这一时期,阿拉伯国家也表现为一种外源性的现代化道路,<sup>②</sup>即外来因素冲击和压力之下引起的内部变革。在民族主义与去殖民化思想占领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之一世纪,泛阿拉伯主义与域外超级大国权势反复决定了阿拉伯诸国的安全现状。<sup>③</sup>一方面,数次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战争使阿拉伯国家疲于应付安全威胁而无法形成更广泛的合作。另一方面,域外超级大国都不乐见泛阿拉伯主义影响下诞生的独立统一阿拉伯国家,为此,美国通过建立与扩大安全联盟的形式影响阿拉伯诸国,<sup>④</sup>苏联通过扶持地区支轴国家的形式影响阿拉伯世界。<sup>⑤</sup>至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安全关切左右了此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基本交往模式,双方难以在弱国家以及安全稀缺的情势下实现更高质量的文明交流。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阿两大文明都更加注重发展问题。这一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向温和与和平,并且放弃狂热的帝国理想走向务实理性,更加突出对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和文明对话的重视。<sup>⑥</sup>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sup>⑦</sup>为例,<sup>⑦</sup>70 年代末之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签署条约 23 条,其中政治条约

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观点:1984 年邓小平会见撒切尔时提到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第三世界、东欧和西欧都反对战争;1985 年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强调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是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中共十三大明确把和平与发展确定为时代主题。参见《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08 年 7 月 4 日,[https://www.gov.cn/test/2008-07/01/content\\_1032279.htm](https://www.gov.cn/test/2008-07/01/content_1032279.htm),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6 日。

② 钮松:《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的特点》,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24 页。

③ 黄民兴:《试析冷战在中东的分期和特点》,载《史学集刊》2011 年第 3 期,第 40 页。

④ 凌胜利:《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的楔子战略影响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05 页。

⑤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22-756 页。

⑥ 陈德成:《全球化与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5-63 页。

⑦ 下文数据皆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http://treaty.mfa.gov.cn/Treaty/web/index.jsp>,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6 日。

占比 17%、经济条约占比 26%、文化条约占比 17%、卫生条约占比 8%。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内,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签署条约 39 条,其中政治条约占比 2%、经济条约占比 23%、文化条约占比 10%、卫生条约占比 28%。此后直到 2015 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签署条约 99 条,其中占比前三位依次是文化 25%、经济 15%、政治 11%。因此,足以说明中阿双方逐步注重经济与文化在中阿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阿拉伯国家在中国外交的战略地位快速提升,为当代中阿文明交流的实质飞跃奠定基础。同时,从中国与各国签署的条约总数来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所签署的政治类条约分别为 236 条与 484 条,经济类条约分别为 256 条与 714 条,文化类条约分别为 112 条与 702 条。从各类条约增幅以及总数来看,都足以证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将重心从安全转向发展,为中阿文明交流从浅层人文交流走向深层文化外交提供可能性。

## (二) 文明交流的平等关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传统意义上构成中阿文明交流的资源限制出现质变(见图 4)。一方面,现当代生产力的发展破除了历史中构成中阿文明交流的地理险阻制约和物质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在物质性限制下降的同时,两大文明交流的观念资源限制也逐步减少,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从古代朝贡体系等级制文明交流走向现代国家间的平等文明交流。因此,两大文明交流有机会突破传统低水准的冷和平,从人文交流走向文化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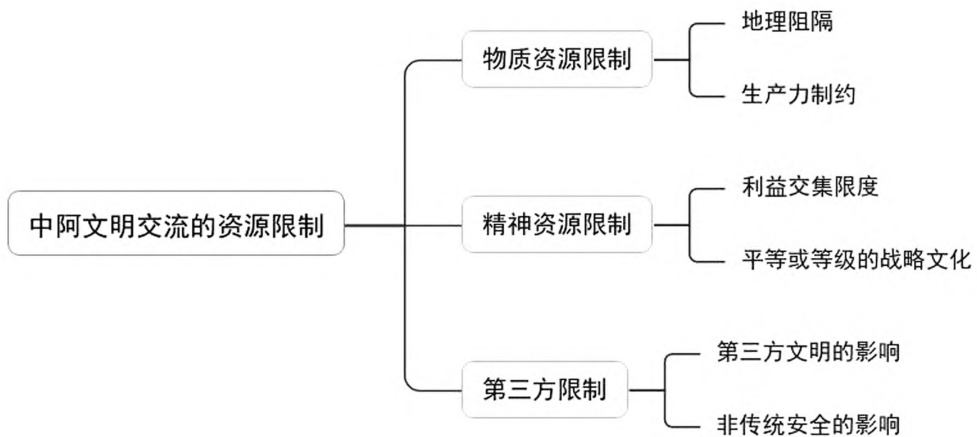


图 4 中阿文明交流的资源限制

中阿文明交流的物质资源限制正逐步减少。

首先,两大文明的生产力都有显著提升。人类文明历史是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即人类能够改造自然能力的历史,文明的地缘性使文明的共同体限定在

一定范围之内,而超越地缘的能力则取决于文明共同体本身的生产力。<sup>①</sup>事实上,自从国家出现以来,人类文明的生产力并非持续发展,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财富、科技才出现飞速提升。<sup>②</sup>在 20 世纪之前,来自亚洲中西部的高原地理阻隔长期限制中阿双方的文明交往,阿拉伯人更多选择通过印度洋航线前往中国,而有此普及的海洋运输能力也不会早于郑和下西洋与新航路的时代。与此同时,欧洲与阿拉伯世界长期隔海相望,欧洲与阿拉伯较高层次文明的交流并不需要有较高的生产力便能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阿两大文明才获得独立发展本国生产力的条件,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两大文明及其生产力的提升近乎颠覆性的使历史中限制中阿文明交流的地理因素不再重要。

其次,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交集也广泛提升。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对彼此的态度出于制衡高原帝国的战略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阿对彼此的定义则是重要的第三世界力量,<sup>③</sup>双方的战略地位得到实质提升。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所签署的条约增加接近四倍,中阿文明交流不再只是历史上受到生产力与国家利益限制的人文交流,而是走向了更成熟的文化外交。特别是 2004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衡、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以及中国和平发展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促使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日益明显,<sup>④</sup>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将阿拉伯国家视为关键支轴区域,两大文明交流更加凸显制度化、复合化、深层化的趋势。

因此,在物质限制下降的条件下,中阿文明交流的精神限制则更为关键。事实上,中阿文明交流已经从古代等级制文明交流走向现代平等的文明交流。自从阿拉伯帝国瓦解之后,没有能够代表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国家力量,阿拉伯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都处于不平等的等级形态,对中阿文明交流而言,则是在古代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与阿拉伯世界进行交流。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向阿拉伯国家提出和平外交与革命外交的倡议,譬如,周恩来总理在多个场合重申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景愿,<sup>⑤</sup>在 1954 年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他系统阐述中国外交方针:在“另起炉灶”“一边

① 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5 页。

② [英国]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18 页。

③ [埃及]阿库斯:《在纳赛尔总统领导下的新埃及》,北京:中国埃及友好协会 1958 年版,第 65-69 页。

④ 安惠候:《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评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3 页。

⑤ 孙泽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论“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载《党的文献》2020 年第 3 期,第 61 页。



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之外,又增加了“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和“团结世界人民”,强调“以上一系列的方针就体现了我们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sup>①</sup>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哲学从革命走向平等。平等的外交哲学既受到毛泽东时代革命外交与和平共处的外交思维启发,同时也是中国国内批判与真理讨论的结果。<sup>②</sup> 平等外交强调外交本身的工具价值以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国家崛起的目标,成功使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者,同时,也使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人文交流与文化外交迎来了大发展时代。这一阶段两大文明所签署的文化条约远远超出革命外交时代,对人文与文化领域的关注达到空前高度。

对阿拉伯文明本身而言,自阿拉伯帝国崩溃之后难有强大国家保卫自身,也难有平等的文明交流。工业革命前,明、清帝国以封贡体系天朝外交使中阿文明交流处于不平等状态。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以现代战争机器又使其对阿拉伯文明的交流处于不平等状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提出的平等交流对阿拉伯文明而言意义重大。

### (三) 应对文明冲突关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文明在政治安全、全球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形成对中阿文明交流的挑战。在政治安全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构筑联盟的形式影响中阿文明交流的战略基础。冷战时期,美国就有通过建立从伊朗——土耳其一线向南部阿拉伯国家延展的安全联盟,从而尝试将阿拉伯地区囊括进反对苏联的阵线。<sup>③</sup> 21世纪后,美国开始构筑针对中国的安全联盟,并强迫中美之间的中间地带国家进行选边站队。无论是米尔斯海默还是布热津斯基,美国国际问题学界与政界都普遍认可阿拉伯——海湾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意义。<sup>④</sup> 随着中国国家利益逐步延展与美国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时代的到来,阿拉伯国家必然需要选择一类基于自身利益的未来世界格局,在高政治领域更加青睐于兼顾收益与排斥风险的行为,在体系压力与霸权正当性之间作出阿拉伯世界的艰难决定。<sup>⑤</sup>

①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88页。

② 刘贞晔:《新中国70年外交哲学进路——革命、平等与引领》,载《国际展望》2019年第5期,第33页。

③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与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页。

④ [美国]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第161页;[美国]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5页。

⑤ 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57-70页。

在全球经济领域,中阿文明交流的物质基础面临西方武器化与政治化经济秩序的风险,西方强调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以排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开始建构不同于殖民掠夺时代的西方文明霸权,尤其强调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并将这一原则延续至今。<sup>①</sup>“基于规则”的秩序,本意即是基于西方的规则从而建构世界秩序,对于既得利益者的西方文明而言,将自身规则散布于世界则是塑造一类有利于自身竞争的世界秩序。西方国家通过马歇尔计划、洛美协议、重建美好世界倡议、全球门户倡议、绿色清洁倡议以及印太经济框架等,尝试塑造西方标准以及西方价值驱动的全球经济模式。西方标准与西方价值驱动的背后实质是西方国家利益的集合,从而使西方文明始终处于全球经济的顶端掌控世界权力的趋势,在此层面,非西方文明的现存经济形态难以符合西方标准,则任其规制损害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

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国家不断渲染作为政治话语的“文明冲突论”,塑造中国与西方、阿拉伯与西方的二元对立。在西方文明长期占据话语优势的世界政治中,二元对立的文明观对中阿文明交流造成重大伤害。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和美国就已经出现“中国威胁论”,并在 21 世纪更加膨胀,最终发展为“文明冲突论”。在“文明冲突论”的语境中,西方国家以西方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文明观,尝试解释西方是否与为何赢得冷战这一最大的时代议题,<sup>②</sup>最终形成了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基石的“文明优越论”和等级制文明观念。在不平等观念、等级制建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以及本体中心主义的加持下,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发生冲突成为常态。在彼时的非西方文明世界,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成为西方文明排斥的重点,因此,如何处理对西方文明的关系以及如何应对文明冲突成为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共同的挑战。

因此,可以将中阿文明交流长期处于友好状态的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以前,较高的资源限制使中阿文明交流处于水平较低的人文交流,既难以出现冲突也难以进行合作;工业革命之后,较低的资源限制使中阿文明交流具备合作或冲突的可能性,在国家实力以及平等交流的前提下中阿文明交流长期处于友好和谐的发展中。同时,为了维持现代中阿文明交流基本处于友好状态与较高质量,需要双方对现实关切的三大维度有基本的认识或是超越,即建设有足够竞争力

<sup>①</sup> 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4 期,第 28 页。

<sup>②</sup> [美国]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6 页。

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为文明交流提供保障,坚持平等而非等级的中阿文明交流形态为文明交流提供基础,塑造中阿文明的本身共性及其特质、建设中阿命运共同体以应对来自第三方的风险。

#### 四、中阿文明交流的前景展望

进入 21 世纪,中阿文明交流在各领域都有实质性突破,为中阿关系以及建设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良好基础。双方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多层面不断强化交流、深化合作。中阿经济互补性持续增强,长期保持良好经贸往来;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双方政治互信和平等交流进一步加强,成规模与制度化的文化外交成为双方文明交流的重要内容,截止 2022 年,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双方已建立 17 项合作机制,其中“文明对话”成为最为重要的对话机制之一,为双方交流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在人文交流层面,“汉语热”在阿拉伯国家不断升温,中国中央电视台阿语、英语、法语频道已广泛覆盖阿拉伯地区。<sup>①</sup>截至 2022 年 10 月,已有 15 个阿拉伯国家的高校开设中文院系,13 个阿拉伯国家建有共 20 所孔子学院及若干独立孔子课堂,以阿联酋为例,已有 171 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超过 7.1 万学生学习中文。同时,中阿双方在影视业、旅游业和餐饮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在生态文明层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治理、生物保护等方面不断合作,丰富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伙伴关系的内涵。2022 年中阿峰会表明,双方对继续倡导文明交流对话、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达成共识,中阿文明交流为深化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和构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注入动力。<sup>②</sup>

因此,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表现出文化外交与人文交流的双重特征,即意味着中阿文明交流具备实质性突破。在文化外交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三大全球倡议构成新时代中国区域治理与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在四大倡议的基础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于中阿峰会、青年群体交流、翻译教育合作以

<sup>①</sup> 丁俊、朱琳:《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机制、成就与意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43 页。

<sup>②</sup> 《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 年 12 月 10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212/t20221210\\_10988459.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212/t20221210_10988459.shtml),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5 日。

及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机制化。<sup>①</sup> 在人文交流层面,中阿双方合作成果丰硕,体现在教育合作、学术研讨、图书出版、媒体传播和民间交流五个方面(见图 5)。<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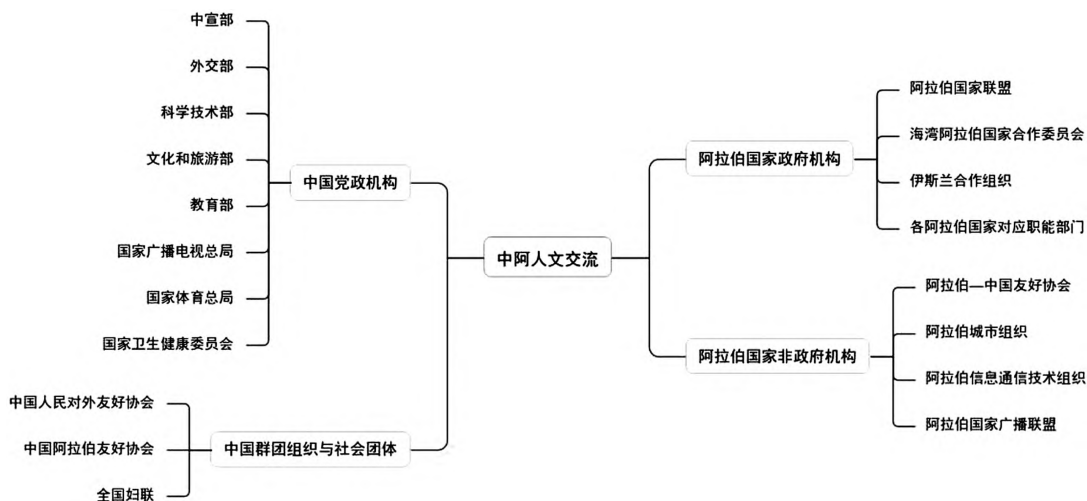


图 5 中阿人文交流相关机构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中外人文交流简报 中阿人文交流机制》,2023 年 5 月 26 日。

当代中阿文明交流之所以取得辉煌成果,是基于对中阿文明交流历史机理和现实关切的双重考虑。首先,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竞争力有实质性提升,是中阿文明交流取得成就的基本保障;其次,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从人文交流走向文化外交,并弘扬中阿文明的共性及其特质,形成共生型文明交流模式,是中阿文明交流的价值取向;最后,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致力于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复杂的外部挑战,是中阿文明交流的坚实支撑。

### (一) 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新发展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对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发展关切。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在参与中东传统安全治理、化解地区冲突方面,中国始终坚持劝和促谈,推动对话协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筑兼顾各方合理

① 阿德汉·赛义德:《文明交流与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载《当代世界》2023 年第 4 期,第 73 页。

② 包澄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第 140 页。

关切的共同安全。<sup>①</sup> 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是“六个坚持”，<sup>②</sup>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则强调在尊重领土主权基础上、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热点问题，进而建立综合的、共同的以及可持续的安全模式，而非以往在阿拉伯和以色列战争中体现出来的无序、单边、强权与联盟政治以及一方独享安全的模式。同时，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缓解阿拉伯国家面临发展动力不足和市场需求有限等难题，中阿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促进中阿发展战略、发展机制和发展项目的三重对接。<sup>③</sup> 全球发展倡议总结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发展成就的经验，包括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坚持行动导向等，为解决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困境提供了有益借鉴和现实路径，有助于构建中阿两大文明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和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与“新质生产力”新理念的提出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方向提供指南。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路径，又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sup>④</sup>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而且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都面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任务，都希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对阿拉伯国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新质生产力”<sup>⑤</sup>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为应对现代国家发展出现的新兴生产方式，尝试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从而超越传统生产力。<sup>⑥</sup> 阿拉伯国家长期在世界市场分工中不占优势地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也都属于全球南方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突破，在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精神生产力的有机结合以及

<sup>①</sup> 刘中民、徐张敏：《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载《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2期，第139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问答》，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版，第219页。

<sup>③</sup> 孙德刚、章捷莹：《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理念与实践》，载《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5期，第90页。

<sup>④</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载《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日，第1版。

<sup>⑤</sup>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载《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第1版。

<sup>⑥</sup>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载《改革》2023年第10期，第1页。



智慧资本的熟练运用等多个层面能够显著提升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发展的质量。<sup>①</sup>

## （二）平等交流、文化外交与中阿共生型文明交流模式

21 世纪以来,中阿文明交流已经从人文交流迈向文化外交空前繁荣的时代,同时,在平等的基础上更强调互鉴、对话、包容以及综合化的互动,以建立共生型文明交流模式。人文交流早于文化外交,没有文化外交的国家之间很可能会有人文交流,而人文交流的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文化外交源于人文交流,同时又高于人文交流,文化外交具有消除误解、增进互信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战略性和政治性,因此文化外交具有高级政治的价值。<sup>②</sup>对中阿文明交流而言,实际上是从人文交流到文化外交再到共生型文明交流模式的不断探索,而平等交流是其根本价值追求。

一方面,全球文明倡议从文明交流氛围、文明交流平台、文明交流主体以及文明交流网络等角度为中阿文明交流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合力营造平等包容的文明交流氛围;发挥平台机制效应,合力提升人文领域全球治理体系效能;激发各领域潜能,合力推动形成人民之间相知相交和民心相通;创新对话交流形式,合力探索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sup>③</sup>对于中阿文明交流而言,应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形成综合的文明交流模式,从而建构新时代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共生文明交流模式。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共生型文明交流模式,传递出人类文明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与相互理解及交而能通、交而能和的文明属性,既体现不同文明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独特性,又展示不同文明间的共同繁荣,从而形成命运共同体。中阿文明共同谱写新型文明交流的时代画卷,是对“文明冲突论”的历史性超越。中阿共生型文明交流模式是双方应对区域治理和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西方政治话语中“文明冲突论”的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中阿共生型文明交流模式也是双方为国际社会贡献的重要公共产品,人类文明如何交流,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创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给出的答案就是互学互鉴、和合共生之道。中阿共生型文明交流模式不仅在理论上对世界文明发展贡献重大,更在实践中对人类社会和平发展作出示范与引领。中阿文明交流模式是平等基础上的和合共生,倡导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反对意识形态对立、制度对抗与文明冲突,与西方“文明冲突论”有根本不同,也与二元对立思

① 汪伟民、李清扬:《新质生产力理论构建及其实践意义》,载《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 年第 2 期,第 45-54 页。

② 胡文涛:《解读文化外交:一种学理分析》,载《外交评论》2007 年第 3 期,第 50-58 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问答》,第 226-227 页。

想有根本差异。

另一方面,中阿双方都需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以形成中阿两大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尝试,也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伟大创造,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人民性,<sup>①</sup>同时,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历史自觉是推动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条件。<sup>②</sup>对于中阿文明交流而言:既需要两大文明秉持历史自觉,从而实现本文明内的传承发展与延续,以适应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又需要两大文明保持交流互鉴,不止是对文明间优秀成果的学习吸收,也要对文明间历史进行批判继承与发展。新时代中阿双方不断通过元首外交、全球倡议以及共铸世界文明和合共生之道实现两大文明的交流、发展与繁荣。<sup>③</sup>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质是以人民为中心、协调发展、和平发展与遵循人类发展规律的文明形态。<sup>④</sup>

为应对 21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挑战,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需要分别创造和构筑符合自身文明特性的文明新形态,从而不断深化和拓展中阿文明交流的新领域,进行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和谐友好的文化外交和人文交流。弘扬中阿文明共性及其特质的当代意蕴即意味着两大文明都需要坚持与时俱进、作出相应变革,阿拉伯文明需要强调本体地位以确立文明信心,从而缓解历史中长期受到的等级待遇,重返现代国家体系下的文明交流;中华文明也需要进一步强调自信、秉持开放与合作的文化国际主义,摒弃古代文化天下主义中的华夏中心观念,吸纳和平、和合、包容等优秀传统因子。

究其根本,当代中阿文明交流的基本态势在总体较好的同时取决于双方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落实文明间平等交流。<sup>⑤</sup>当前,世界文明图景正发生重大变化,<sup>⑥</sup>“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观念正出现改变,东方文明正在重回世界舞台中央,西

① 孙熙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世界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2 期,第 26 页。

② 孙代尧:《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第 16 页。

③ 丁俊:《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共铸世界文明共处之道》,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13 页。

④ 陈金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征》,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第 5 页。

⑤ 郭树勇:《从文化天下主义到文化国际主义: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理论嬗变的一种考察》,载《国际观察》2024 年第 1 期,第 1-47 页;郭树勇:《文化国际主义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9 期,第 109-127 页。

⑥ 韩炯:《世界文明图景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载《历史评论》2022 年第 4 期,第 12 页。

方文明的中心地位日趋式微,两者共同引发全球秩序的重塑与变革。在此意义上,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同为上升中的文明共同体,双方不仅相互依存与长期共存,还需要强化合作共同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 (三) 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以应对时代挑战

新时代以来,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不断推进更加综合与多元的文明交流新模式,同时,也面临更加复杂的风险和挑战。一方面,传统的第三方文明依然对中阿文明交流产生困扰,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多个层面制造对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对立与碰撞。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影响文明交流的重要因素。以新冠疫情为例,世界旅游组织统计 2020 年国际游客量下降 60%~80%,严重阻碍了旅游交流、教育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和体育交流等人文交流,<sup>①</sup>各文明交流的主体一度只能采取线上平台的形式参与人文交流,使文化外交接近瘫痪。

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将在多个层面使两大文明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第一,中阿命运共同体是全方位、多领域、综合性以及大规模的多边命运共同体,是对西方塑造竞争型全球产业链、安全化国际问题以及渲染“文明冲突论”和二元对立价值观的积极应对。中阿命运共同体是以伙伴关系为基础,涵盖经济、社会、文化以至于生态等多领域的综合命运共同体,强调安全和发展的不可分割性,强调合作与文明的不可隔离性,强调安全、发展和文明的复合性。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国土面积之和占世界的六分之一,人口之和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sup>②</sup>在友好交往的历史基础上,中阿文明能够实现对安全、发展和文明问题新困境的突破,是对排他性安全观、竞争性发展观以及等级性文明观的超越。

第二,中阿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应对共同挑战,是对非传统问题和风险的有力管控。近年来,大国竞争时代与现实主义回潮,使全球应对非传统问题的能力下滑,全球治理出现缺失,世界大国更倾向于获取权力而非承担义务,世界秩序的失序风险急速攀升。中阿命运共同体本质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相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体现。中阿命运共同体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支持变革的而非颠覆的世界秩序,支持公正合理的而非一家独大、一方独霸的全球治理,支持国际关系

---

<sup>①</sup> 赵岩、何思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意义、挑战与建议》,载《南方论坛》2021 年第 6 期,第 81 页。

<sup>②</sup> 习近平:《让中阿友谊如尼罗河水奔涌向前》,载《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20 日,第 1 版。

的民主化、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和世界文明的平等与多样化。第三,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能够在国家、区域和国际等多个层面为两大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平台。国家层面,两大文明都需要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复杂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抓住新一轮全球发展的机遇;区域层面,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能为中阿双方共同推进区域治理提供合理方案,也为全球治理贡献出中阿智慧;国际层面,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及两大文明的交流发展为世界文明互学互鉴与和合共生树立起榜样,从而引领世界文明间交往交流的正确方向。

因此,为应对 21 世纪中阿文明交流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需要双方持续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事实上,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论述建设中阿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并且多次发表关于中阿文明交流的重要讲话和论述,<sup>①</sup>为新时代中阿战略合作和文明交流互鉴定向把舵。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身含义来说,包括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以及生态建设五大层面。<sup>②</sup>对于建设中阿命运共同体而言,则是指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逐步确立和完善战略伙伴关系,从与 13 个阿拉伯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扩展至全部阿拉伯国家,在此基础上形成涵盖经济、文化与文明等综合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2024 年 5 月 30 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时表示,中阿双方要通过构建“五大合作格局”,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包括更富活力的创新驱动格局、更具规模的投资金融格局、更加立体的能源合作格局、更为平衡的经贸互惠格局以及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格局。<sup>③</sup>首先,双方需要继续深化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此基础

<sup>①</sup> 参见《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其中论述中阿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有:2014 年 6 月 5 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会议讲话、2015 年 9 月 10 日中阿博览会贺信、2016 年 1 月 19 日在埃及发表《让中阿友谊如尼罗河水奔涌向前》、2017 年 9 月 6 日中阿博览会贺信、2018 年 7 月 10 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会议讲话、2018 年 10 月 25 日第四届“阿拉伯艺术节”贺信、2019 年 3 月 31 日阿盟首脑理事会贺电、2020 年 6 月 22 日中阿政党对话贺信、2020 年 7 月 6 日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会议贺信、2021 年 8 月 19 日中阿博览会贺信、2022 年 11 月 1 日阿盟首脑理事会贺信以及 2022 年 12 月 8 日三环峰会等。其中论述中阿文明的有:2015 年 9 月 10 日《2015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2018 年 7 月 10 日《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2018 年 10 月 25 日《习近平向第四届“阿拉伯艺术节”闭幕式致贺信》、2022 年 12 月 8 日《传承千年友好,共创美好未来》、2022 年 12 月 9 日《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以及 2023 年 4 月 3 日《习近平复信阿拉伯知名艺术家代表》。<http://jhsjk.people.cn/>, 上网时间:2024 年 5 月 7 日。

<sup>②</sup>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问答》,第 74 页。

<sup>③</sup> 《习近平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中阿合作论坛,2024 年 5 月 31 日,[http://www.chinaarabcf.org/zyhd/202405/t20240531\\_11366643.htm](http://www.chinaarabcf.org/zyhd/202405/t20240531_11366643.htm), 上网时间:2024 年 6 月 7 日。



上通过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巩固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合作,并开拓绿色低碳、健康医疗、投资金融等新增长极,在科技创新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推进 5G 通信、核能、航天卫星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增强战略自主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构建新的中东安全架构,同时共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反对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特定宗教挂钩。其次,双方需要深化在教育、文化、卫生、新闻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促进文明互学互鉴,通过中阿典籍互译、艺术家互访等项目,加强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最后,中阿双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支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 五、结语

人类文明交流的历史图景呈现出交流合作与碰撞冲突并行的动态画面,不断在曲折中发展与进步,从早期的人文交流逐步迈向深入的文化外交。虽然文明交往中冲突有时不可避免,但中阿文明交流却实现宝贵的千年友好,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和包容互鉴,形成了弥足珍贵的中阿友好精神。新时代以来,在三大全球倡议、文明间平等交流以及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等加持下,中阿文明交流将会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同为人类历史中的伟大文明,双方需要在国家建设、文化外交以及命运共同体构建三大层面实现进一步合作,从而进一步保障与提升中阿文明交流的质量。

在国家建设层面,中阿双方需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满足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对于发展与安全的基本追求与关切,从而替代传统国家建设中排他性的安全和竞争性的发展。此外,双方还需要兼顾新型现代化与新质生产力,使时代化的国际关系元素参与现代国家建设,从而为中阿文明交流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在文化外交层面,古代中国的天朝思维以及文化天下主义的中心思想不再存在,现代中国以平等、公正与合理的文化国际主义理念参与中阿文明交流,同时,阿拉伯文明在长期文明交流不平等的地位中得到中国的尊重,开始强调文明的主体性以确立文明自信。此外,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逐步确立起共生型文明交流模式,反对等级性的文明交流,从而为中阿文明交流提供新的价值取向。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是双方文明交流为应对时代挑战的共同智慧与坚实支撑。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提出推动共建



“五大合作格局”在阿拉伯国家各界引发热烈反响。<sup>①</sup>“五大合作格局”为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提质升级指明方向,展现了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愿景。

新时代中阿双方积极践行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隔阂与冲突的理念,对于促进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阿共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东方古老文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携手共铸世界文明和合共处之道,不仅为增进中阿民心相通、助力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动力,而且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不同文明交而通、交而和的伟大智慧,为当今世界文明交往互鉴、美美与共树立了榜样。<sup>②</sup>中阿双方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文明对话,反对文明冲突,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一理念不仅符合中东地区多样文明交往交流的历史传统,而且符合中东地区多元文明谋求和谐共生的现实需求。因此,积极践行这一新的文明交往观对于推进中东地区治理至关重要。中东的多样性应该成为地区活力之源。然而,各种霸权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却在中东地区不断制造文明断层线,蓄意煽动“文明冲突”,试图将霸权利益的冲突转化为文明的冲突,将中东地区变成为文明冲突的前线。中阿双方通过文明交往交流和互学互鉴,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尊重地区文明与文化的多元共生,进而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

新时代以来,中阿双方坚持秉承丝路精神,弘扬和平文化,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力助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民心相通,为中阿合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人文滋养,西方舆论热衷炒作的“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越来越不受欢迎,中阿两大文明的交往交流不仅成就突出,而且意义重大,前景广阔。

(责任编辑:章远 责任校对:包澄章)

<sup>①</sup>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阿拉伯国家各界热烈反响》,中阿合作论坛,2024年6月3日,[http://www.chinaarabcf.org/zyhd/202406/t20240603\\_11375527.htm](http://www.chinaarabcf.org/zyhd/202406/t20240603_11375527.htm),上网时间:2024年6月7日。

<sup>②</sup> 丁俊:《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根深叶茂》,载《光明日报》2022年12月10日,第8版。

## Abstracts

### 3 China Arab Civilization Exchange: Historical Mechanism, Real Concern and Prospect

**Abstract** The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in the world are diverse and varied. Major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do not exist independently, in conflict, or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re the norm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exchange, learning,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provide a powerful and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motiv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For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the main theme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has been mutual assistance,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 and mutual learn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are shaped by the factors of their power base, material resource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third parties. As a result, there have been practical concerns about the exchange of civiliz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emphasizing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ursuing equal status, and responding to cultural conflict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is the overall goal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s Arab states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ing civilization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is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efforts in diplomacy towards Arab states in the new era. On the one hand, China and Arab states need to implement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nd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shape China and Arab with sufficient competitiveness, and thus ensur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xchange of the two civiliz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both sides need to implement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promote cultural diplomacy and equal exchange of civilizations, establish a new form of symbiotic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rab states, and thus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two major civilization exchanges.

**Key Words** China; Arab States; Civilization Exchanges; China Arab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uthors** DING Jun, Ph.D, Professor,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LI Qingyang,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